本版编辑：李少军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编者按：前不久，由上海财经大学田国强教授和陈旭东博士撰写的《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一书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在2015年11月8日颁奖典礼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颁奖词中说：“田国强、陈旭东的著作《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对中国改革历程作了系统的归纳和分析，分析了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启示意义，……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有益思路。”吴敬琏先生为本书作序，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院长周其仁教授、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王一江教授、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分别为本书撰写了推荐语。

明中国变革、振兴和长治久安之道

□ 蒋传海

近来，我认真研读了《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一书。这本书从历史、逻辑和未来三个维度对中国改革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解析，能让我们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更广阔的视野、更开放的视域来认识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刻的重大变革。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明道”：明中国变革之道、明振兴中华之道、明长治久安之道。本书分五大部分共32章，包括总论、回顾改革、理解改革、求解改革和深化改革，其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改革的历史考察及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总结

作者主要通过历史大视角进行比较，把改革开放置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历史场景之中进行考察，他们发现这170多年的历史具有四个明显转折性全局意义的社会经济变革：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图强、辛亥革命与市场经济的探索、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联姻、改革开放引领的复兴之路。通过比较研究，他们认为四次变革三次未取得实质成功，而改革开放则引领中国走向了复兴之路。前三次变革，包括洋务运动时期、抗日战争前后及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以国有经济推动工业化的尝试尽管取得一定成效，但均未能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正轨，均未实现国富民强，因此三次均未取得实质成功；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通过对内松绑放权、对外开放的改革举措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和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引领中国走向了复兴之路。

对于改革开放成功的基本原因或基本经验，他们认为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正确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二是推行松绑放权的市场化改革；三是实行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社会；四是中央向地方分权鼓励了区域竞争；五是以渐进改革策略促平稳转型。

关于改革的逻辑

中国经济改革，实质上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这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逐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如何理解市场化的改革？作者运用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关于激励和信息的机制设计理论来分析为什么要选择市场化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内在逻辑是什么。

他们首先对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比较。计划经济有效运转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中央计划机关能够全面地、及时地掌握一切经济活动的决策信息，即信息有效；二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完全一致，不存在个人私利，即激励相容。但是由于社会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太高，不可能掌握全部决策信息，以及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们思想觉悟没有那么高，还存在追求个人私利的客观现实，因此计划经济不可能有效运转。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弊端就在于信息的问题和激励扭曲。

而市场机制是一种分散决策、自愿交换产品和服务的经济组织形式，通过竞争形成的市场价格，可以有效传递生产和消费的信息，使人们基于自己的私利自愿地决定向市场提供多少产品或服务并决定收入分配，价格引导资源配置可以尽可能地达到最优状态，这就是为什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或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所在。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有时会失灵，这就需要政府单独或和市场一起解决，并有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其次他们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内在逻辑。改革初期面临的一个客观事实是社会物资资源匮乏，在充分考虑人们比较注重自身利益和信息不对称的约束条件下，充分满足任何一个经济机制良好运行的四个先决条件：承认个体利益、给人们更多的经济自由、实行分散化决策和充分调动个体积极性，有效解决信息和激励问题，逐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定条件下的改革推动发展，发展让老百姓不断获利而促进稳定，从而创造了加大改革力度的条件，推动经济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内在逻辑。

关于改革的未来

关于改革的未来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未来10—20年中国将跃居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是要实现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必须找到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变。

首先，他们批评了所谓的“中国模式”。一些学者对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冠以“中国模式”，作者认为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至多只有中国道路、中国路径，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方面符合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另一方面我们还处于制度转型过程之中，很多东西还没有定型，“模式”这个词可能会有很大的误导性，应该“少提”“慎提”，以防止人们陷入一种静止的、僵化的形而上学框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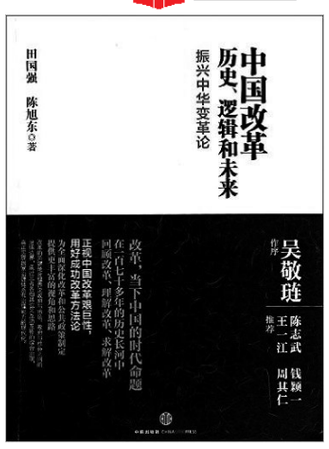
其次，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坚持市场化改革和开放的正确方向。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其他方面的改革比较滞后，使得中国面临成就巨大但问题也突出的“两头冒尖”现象，根源在于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滞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不清晰、不合理，导致“三重三轻”的不科学发展：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他们认为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中国改革的路径必须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全方位联动改革，通过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牵动社会经济各项制度的合理化和现代性转型，尤其是重新思考和界定政府的基本职能，最终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理治理边界，成为政治经济强国，未来世界的领导者。归纳起来，中国下一步改革发展要实现“四个转向”，即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全方位联动改革，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从国际体系的追随者转向未来世界领导者。

再次，他们论述了富民强国的内在逻辑。基于历史上国内外几千年的强国实践，结合现代经济学理论，他们认为富民强国的内在逻辑在于：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赋私权；保私权，必限公权。

关于明道、树势、优术、抓时四位一体的改革方法论

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面临的形势复杂，任务艰巨，基本上都是“难啃的骨头”，因此要正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用好“明道、树势、优术、抓时”四位一体的改革方法论来进行系统的全方位联动改革。一是“明道”，就是明了改革的方向和路线：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树势”，必须发挥中央顶层独有的权威。三是“优术”，细节决定成败，改革的方式、方法要对头。四是“抓时”，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改革时机，现在改革的空间越来越狭窄，越往后，改革将越艰难。

学思录



书名：《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
作者：田国强　陈旭东 著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4年6月

用典释义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讲话原文】

中国古代哲人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人民，必须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前不久，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安塔利亚峰会上，我倡议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积极行动起来，落实好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此，要把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纳入各自国家发展战略，确保有效落实。要建立全面发展伙伴关系，调动政府、企业、民间等各方面力量，为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贡献。要推动包容和谐发展，尽早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各项指标，同时通过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创造新的空间、实现相互促进。

——习近平《发挥亚太引领作用 应对世界经济挑战——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2015年11月18日）

【出处】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春秋）管仲《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解读】

《管子》是先秦诸子中成书较早的一部经典，其中记载了许多治国思想。在其丰富的治国思想中，富民思想是其精髓。

管仲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但凡治理国家的方法，必须首先使百姓富裕起来。他通过“治国常富，乱国常贫”的鲜明对比，进而得出“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的道理。

治国必先富民，富民然后强国，这是《管子》关于春秋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发展模式。管仲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性，认识到富民对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巨大作用。正是由于抓住了治国的根本，经过多年的治理，齐国很快强盛起来，成为春秋首霸，历史上才有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盛举。

（杨立新）

如何养浩然之气

□ 纪翔

在经典修养方法中，有一种广为人知，却不一定为人所深知的重要方法，即养“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就是人间一种至大至刚的正气，是一种无往不克的气魄，充塞于天地之间，至高至上，宏大无量。这样一种正气，并非是神秘的、不可知的，而是社会道德在个人身上的融会升华，是为之必有理，行之必有道的人间境界，是忘我的、无私的、至为公道的，也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圣贤气象。

孟子对如何养浩然之气作了纲领性的论述，他讲：“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他在此着重提了两点：“以直养而无害”和“配义与道”。

以直养而无害

浩然之气的修养必然是直的，正道直行，绝不是教人在扭曲中得一个小安宁，而是在人间大熔炉中得一个大平静。《易传》中讲“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真心认为对的就去做，反之就不做，决不能自欺欺人、委屈扭捏，明知不对还以身试法，这样无论如何只能成为一个小人，与正道无关。

自古以来的为政理念都以直为上，以曲为下，认为“直”是一个好官应有的德行。北宋名臣包拯曾作诗道：“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他一生清廉，为人不苟，成为后世传颂的对象，他“直道”“不作钩”的尚“直”思想，是为官者、知识分子风骨气节的集中体现，是百姓对以“直”为官的强烈诉求的集中反映，也是他本人作为文化符号的内容。

配义与道

养浩然之气的根本原则是“配义与道”。“以直养而无害”并不是讲没有变通的莽直，而是以“义与道”为内容的直。义就是适宜，就是行为的合理合宜。道就是公道、大道，是最平淡自然的思想原则、行为原则。如果并不能以道为原则，以义处事，那么所谓的“直”只能是一种莽直，是狭隘的，并且一定不可能在广阔天地间始终保持的“直”。孟子认为，如果不以“义与道”来修养，就会养成一种软弱坏败的气，因为脱离“义与道”的行为是并不能够被自己认可的（“不慊于心”）。而以“义与道”来修养，其方式必然是“集义”，就是不断地做适宜的，道德认可的事情，而不是偶然做一两件（“非义袭而取之也”）。普通人凭借“集义”的量的积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质的飞越，生成浩然之气，进入圣贤境界。

历代官德中所讲的直，都是有“义与道”的内容的。包拯的直，体现在对正义的维护中，对奸邪小人的厌恶和对盛世治理的向往，就是他的直。文天祥的直，体现在民族气节中，对国家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愤恨，就是他的直。其实，“直”的德行，无一例外地存在于百姓称颂的历代名吏身上，只是或大或小，内容有所不同。他们的事迹，无论何时读来，都是荡气回肠，而浩然之气就借之存在于数千年历史中，鼓舞万千百姓，造就代代英雄。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此言一出，便为百世千年立下路标，英雄豪杰，望之嗟叹，志士仁人，体之深思。养浩然之气，应当是许多人的修养目标，对领导干部却有特殊的意义。干部队伍的素质，直接影响普通百姓的素质；干部队伍的风气，直接影响社会各阶层的风气。如果广大领导干部能以为人民服务之心，走在“集义”的道路上，循序渐进，也就必能引领恢宏正气。

书而思

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读《当代资本主义跟踪研究丛书》

□ 俞可平

按照国内的流行分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依旧是当代世界各国的两种基本体制，资本主义依旧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对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体制之间依旧还在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唯其如此，要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了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所以，跟踪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始终是我国理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更是作为中共中央重要思想库之一的中央编译局的一项常规任务。这一套《当代资本主义跟踪研究丛书》，便是中央编译局众多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跟踪研究成果之一。

我曾经说过，像一个人长着两只眼睛一样，资本主义身上也长着两只富有思想的眼睛，时刻注视着自身的变化。从政治倾向来说，一只是右翼思想家的眼睛，他们从积极的和肯定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变化做出解释和论证；另一只就是左翼思想家的眼睛，他们从否定的和批判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的变化做出分析和评论。作为局外人，我们了解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的最佳捷径，莫过于借助于这两只眼睛的观察。

这两只眼睛对于全面客观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都同等重要，两者既不可或缺，也不可偏颇。借助“右眼”，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文化创新和治理变革等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尤其可以看到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人类文明的新贡献。借助“左眼”，我们则可以发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生态环境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存在的严重弊病，尤其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人类文明所带来的危害。“独眼”和“斜眼”看西方，都不可能有正确的结论。

这套《当代资本主义跟踪研究丛书》也不例外，编者主要选录的是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评性观察。

批判性是这套丛书的首要特征。所选的许多文章无情地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和困境，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社会矛盾、经济衰退、生态危机、民主赤字和文化堕落，分析了产生这些弊端的体制性原因。其次是前瞻性，丛书的不少文章着眼于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分析和预测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并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未来前景做出了各种判断。其三是多样性，丛书所选文章不仅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本身在发展模式、社会结构、体制机制、公共政策、文化传统、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多样性，而且还对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多样性做出了多视角的分析，从而得出了丰富多彩的结论，既有乐观的，更有悲观的。

先哲曰：“见贤思齐”，“择善而从”，此乃君子之美德。正如个人一样，一个有强烈进取心的民族和国家，也要善于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事物，向先进者看齐，勇于发现并努力克服自身的不足。先哲还曰：“见不贤而内自省”，“择其不善者而改之”。看到别人的不足和短处，应当反省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弊病，如果有类似的弊病，则应努力改正。不能以别人的缺陷来为自己的不足做辩护，更不能去比谁更不好，而要以别人的弊病为警戒，来防止自己重蹈覆辙。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愚昧、剥削、压迫、专制、好战、不平等，为的是建立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加文明、自由、平等、民主、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当代的资本主义，同样应当怀抱这样一种崇高的理想。

书海泛舟

（上接1版）

跟总书记学文风，就要学习他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做人作文，讲实话、讲真话、讲心里话

2012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专门讲了实事求是问题。他指出，办实事，就是要求从点滴入手、从具体事做起，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戒空谈。求实效，就是要求雷厉风行、狠抓落实，不抓则已、抓则必成，做出实实在在的业绩，不好大喜功、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作文如做人，跟习近平总书记学文风，同样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

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就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一系列实事求是的理念和观点。在思想观念方面，他有篇短文题为《搞试点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在文中强调“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怎么有利于发展就怎么改革；要超越原有的体制，从根本上冲破束缚发展的桎梏”。在利用民资方面，习近平在2003年8月的《之江新语》中提到，要“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扩大民间投资的规模，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在引进外资方面，要求用“两条腿走路”，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引外商落户，吸引外资投入，扩大对外贸易，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提出“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非农化”要求和“以发展强村、靠建设美村、抓反哺富村、促改革活村、讲文明兴村、建法治安村、强班子带村”目标。在科技方面，倡导“充分发挥人才在技术创新中的关键作用，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使经济发展真正走上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在社会管理方面，强调要“树立新的稳定观”，要求把学习推广“枫桥经验”作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抓手。后来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继续身体力行，他在中央党校的19次开学讲话，每次篇幅都不长，每次都讲得实实在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跟习近平总书记学文风，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温，每次学习都有新启发、新收获，真正是常学常新。党风、文风、学风、会风、政风、民风，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通过改进文风，推动形成清正党风、清正社风、清正民风，以良好的作风服务于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跟习近平总书记学文风的主旨和根本目的所在。

（作者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